

关于商周金文中的“赐贝”及与货币相关问题

陶霞波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贝是商周早期金文中常见的赏赐物品。学术界一直以来认为贝是作为货币, 具有财富意义而被赏赐。但是贝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地位聚讼不已, 故而有必要对作为赏赐物的贝的真正内涵作一番探求。

关键词: 贝; 金文; 赏赐; 货币

中图分类号: K877.3 **文献标识码:** A

赏赐是商周金文中重要的内容, 在众多的赏赐物品中, 贝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商和西周早中期的金文中多见, 西周晚期急剧减少, 至东周时代的金文中已无一例。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赐贝”问题实际上只涉及商和西周金文。

通过对《金文语料库》中所收的金文资料进行了排查, 贝字在商周金文(不排除同器同铭)中出现情况如下表:

殷	47
殷或西周早期	5
西周早期	104
西周早期或中期	3
西周中期	25
西周晚期	4
战国	1
总计	189

用于赏赐这一语境下的贝字统计(不计同器铭)情况如下:

殷	39
殷或西周早期	3
西周早期	88
西周早期或中期	3
西周中期	21
西周晚期	3
战国	0
总计	157

对比以上二表可以发现: 在商周金文中贝字大量的出现在赏赐语境之下, 尤其是在西周的早期, 在西周中期就较少提到, 东周则不提。可见在商和西周早期, 贝在人们的赏赐活动中出现比较频繁。对于此语境中的贝, 学术界一直以来都看作是当时的一种货币, 以“朋”为单位。受中国货币发展史理论的影响, 一般通行的说法认为贝是中国古代最初的货币形式。主要的依据是: 商周墓的发掘中有大量的贝出土; 《尚书》等重要的上古文献对“贝”的记载; 汉字中关于财产的字很多是从贝的。事实上, 从文字学角度来论证用贝作币是要有时间和条件的限定的。就已确定可释读出的甲骨文而言, “基本可以释读并含义较清楚地从贝的字不过 16 个。这 16 个字中, 有的是地名、方国名或人名, 有的用于祭祀等活动, 少数用于

动词，但都看不出这些字的造字是专用于经济目的。”即使大量有钱财意义的字从贝，也只能说明古时物品授受、财富积居与贝有关，这是由于贝具有得之不易、携带方便的属性，还不能以次认定贝具有货币的职能。再者，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且不论记载的确切性，仅就《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一句证明商代贝是货币，恐怕分析欠妥。篇末有“货宝”（《盘庚》：“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对举，说明贝玉具有财富的意义，而其装饰价值和经济意义孰轻孰重则不得而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此处“贝玉”乃是一种葬具。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属于殷文化时期（商代早期开始）的各地遗址和墓葬出贝极为普遍，有“口含贝、手握贝、脚置贝、舆载贝”的现象；西周的墓葬亦常有贝出土，有资料表明，就周原扶风地区发掘的 103 座墓葬中，48%的墓有贝随葬，数量几枚到百枚不等，从出土的方位看，也有口含手握的，也有散置棺外的。一般认为，附着身体的，体现的是贝的装饰和葬仪的文化意义；相对的，散置或置于容器内的，则说明了贝具有象征财富的经济意义。可见，上古时代贝的身份并不单一，那么在赏赐中的“贝”扮演何种角色？不考虑时间概念和背景条件而简单化一的理解为货币是不是过于偏颇了？

简单的说，贝在上古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当是由装饰品始，也以装饰品终。它们具备货币功能的年限，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依据出土情况，一是认为贝在商代后期和西周已开始普遍当作实物货币使用；一是认为贝在商代后期以退回到装饰品的地位。依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源自交换，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当与社会生产和交换水平相适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的序列大致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金属铸造货币时期。可见实物货币是交换比较原始性阶段的产物。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产生，实物货币为金属称量货币所代替；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级的出现，金属称量货币最终由金属铸造货币代替。众所周知，商族是以善于经商载入史册的。《尚书·酒诰》：“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商器上那些荷贝形的族徽多少也能看出些史影。可见晚商时期，社会第三次大分工无疑已经成熟。1953 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出土三件无文铜贝；1971 年山西保德一座商代晚期墓中出土的铜贝多达 109 件，海贝 113 枚，与车马器同坑出土。关于周代的铜贝，商周考古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可靠的纪录。但是在西周金文中有这样一条铭文一直以来被学术界看作是周代铜贝使用的左证：

《鞫卣》：鞫从师雉（雍）父戍于古白。蔑曆。易（赐）贝卅孚（铔）。……（西周中期）这是金文中仅见的以“孚”作为贝的单位的纪录。联系西周《禽簋》有“王易（赐）金百孚（铔）”（西周早期）、《师旗鼎》有“白（伯）懋父乃罚得斲古三百孚（铔）”（西周中期）等铭文，可知“孚”是当时金属的总量标度，也就是金属称量货币的单位。所以，《鞫卣》中的贝应该是金属质地的贝。

由于金属称量货币时期，货币没有特定的形态，按照重量进行交易，各种青铜器都可以充当货币使用，因此在商代后期和西周不可能划分各种青铜器和货币的界限。周原遗址有丰富的青铜称量货币出土也印证了铭文的记载。充当称量货币的有青铜器、专铸的称量货币和各种铜料。从周原出土的铜器残片上，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铜片“不是从体小胎薄容易破碎的青铜礼器上砸下来的，而都是些体大胎厚，十分难碎的大型铜器残片，”这说明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除了作铸铜材料外，用于交换，充当金属称量货币角色恐怕不能排除；另外，铜器中常见刮铭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于赏赐、俘获、交换等器物“易主”的原因所致，其中交换的原因应该是主要的。

且不论铜贝和这些金属称量货币的关系如何理解，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商代后期和西周时

实物货币才开始普遍使用是和实物货币的比较原始性相矛盾的。尤其是在金属称量货币出现以后，贝作为实物货币的地位如何保持？

值得重视的是很多商代和西周墓葬的发掘报告从贝的随葬位置和出土情况论述了它作为装饰品的性质。比如，在殷墟和西周的车马坑中常发现用贝作为马络头；西周墓葬中在殉葬狗的颈部、眼眶中常有贝发现；在西周晚期的上村岭虢国墓地，发现了贝和蛤壳穿在一起的串饰。这表明贝的装饰性功能自始至终是保持的，这势必限制贝的流通，导致贝的仿制品、代用品纷纷出现，早在可能属于夏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文化的河南陕县七里铺就已经发现一枚骨贝。贝质地的多元化不仅使之价值尺度的标准无法衡量，还会导致贝自身价值的贬低。所以会出现很多随葬品极为贫乏的墓和殉葬奴隶也用贝随葬的现象。那么不再珍贵的贝，为何还能跻身在赏赐品的行列呢？

我们以为，贝在历史舞台上的总结并非仍是以装饰品的身份，墓葬出土的贝我们很难说定是有货币意义还是装饰意义，但是贝在商周墓葬中的普遍发现，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商代后期和西周，贝的文化意义发生了转变，从单纯的装饰品成为一种普遍而必要的葬仪用品。

在金文琳琅满目的赏赐物中，除贝之外，还有香酒、服饰、礼器、牺牲、车马、兵器、旗帜、田邑、臣仆、金玉、布帛等等。品目虽多，但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祭祀用品、战争用品和财富象征物。这里多少折射了那个时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氛围。

在金文材料中，值得我们研究货币时特别给与注意的是和贝性质相近的“金”：

《叔簋》：隹(唯)王^葬于宗周。王姜史(使)叔事于大^倕(保)。^商(赏)叔鬯鬯、白金、芻牛。……(西周早期)

《矢令方彝》：……明公易(赐)亢师鬯金小牛。曰。用^禘(祓)。易(赐)令鬯、金、小牛。曰。用^禘(祓)。……(西周早期)

参看两条铭文，不难发现赏赐香草是为了调酒，赏赐小牛是为了做牺牲，赏赐金，也是为了祭献用的。祭祀时献金是一种礼制，《周礼·职金》：“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这一传统延续到秦汉。可见，赏赐语境下的金显示的不是其货币职能。这不得不使我们对赐贝的文化内涵作一番审视。

前文已经提及商周墓葬出土贝时有“口含贝、手握贝、脚置贝、輿载贝”的情景，这就和西周礼制中对葬贝的描述取得了基本的一致。《仪礼·士丧礼一》“贝三实于筭……主人左报米，实于右，三实一贝，左、中亦如之”，说明丧仪中要准备贝，下葬时在尸主之口的右边填米，中间及左边填贝；《礼记·集记下》：“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大戴礼》：“天子饭以珠，含以玉；诸侯饭以珠，含以璧；士大夫饭以珠，含以贝”，不仅说明了贝为死者的“口实”，而且还将含贝的意义作了等级界定。商葬用贝除了发掘材料外，卜辞中没有什么记载，但是从《仪礼·士丧礼》有关祝人的仪式活动来看，为死者口中填塞贝含是属于“商祝”，周人袭商礼，只是商代的礼制没有周代那么完备和等级森严。

根据《仪礼·既夕礼》、《礼记·丧大记》的记载，商祝在仪礼中要给灵柩进行通灵招魂和象征死者生前生活的装饰；周代仪葬，死者口中含贝、含玉或葬贝有表示饭食的含义，可见贝与古代人类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直以来，人们把眼光集中在贝具有的美丽光泽能增加人们的装饰美，而其生产于海边，中原不易得到，因而显得价值珍贵；而且体小轻便，不易破损的性质，很容易获得货币的职能。但是作为祭祀品的贝，意义恐怕不限于此。云南景宁石寨山等地出土很多古滇王国的贮贝器，里面装有大量的海贝。这些遗址的年代当在西汉时期，此时铜钱已经大量使用，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海贝。人们葬贝意义何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结论可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从人类学的调查来看，人类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和自身繁衍，这两类象征是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象征通过仪式来体现。贝的生殖意义象征应当是在先民精神中最先形成的概念，所以在货币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遗址多发发现葬贝。从商代到西周，贝即使出现货币功能但是范围也有限，时间也不长，在西周

金文中贝以葬仪用品的身份而被赏赐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正是由于贝的象征性源自其形状的隐喻，即贝本身的质地就不再重要，因而仿制品大量的出现。如此一来，葬贝只具有等级意义，贝就很容易被更能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青铜礼器取替而沦为一般的不怎么珍贵的随葬品，在中原的周代墓葬中，可以发现时代越晚，真贝越少，直甚至连假贝也不随葬了。

参考文献:

- [1] 汪庆正. 十五年以来古代货币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J]. 文物, 1965 (01): 26-28.
- [2] 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 货币起源问题座谈会纪要 [J]. 中国钱币, 2001 (4): 30-36.
- [3] 郝本性. 关于周代使用钱币的探索 [J]. 中国钱币, 1984 (4): 1-4.
- [4] 王纪潮. 楚骨贝的货币性质辨疑 [J]. 江汉考古, 1996 (4): 56-57.
- [5] 朱活. 古币续谈——谈我国先秦货币中的铜贝 [J]. 中国钱币, 1985 (2): 5-7.
- [6] 喻明高. 古代货币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J]. 中国钱币, 1984 (3): 3-35.
- [7] 罗西章. 从周原出土文物试论西周货币 [J]. 中国钱币, 1985 (2): 14-21.
- [8] 王毓铨. 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6-27.

On “granting cowrie” of bonze inscription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relation to currency

TAO Xia-b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owrie is always used for granting in the inscription on bonze of Shang-Zhou Dynastie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owrie is a kind of currency and possesses the meaning of wealth. Ideas vary on the cowrie'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rrency develop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ranting thing—Cowrie.

Keywords: cowrie; bronze inscriptions; granting; currency

收稿日期: 2003-9-10

作者简介: 陶霞波 (1978-), 女 (汉族), 浙江杭州,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研究生。